

语言与传播丛书之十四

# 路途和手段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于根元摇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 作者简介

---

于根元，男，祖籍江苏泰兴，生于上海市。1974年7月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了10年，在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工作了15年。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研究员，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王蒙小说语言研究》（大连出版社，1988，同刘一玲合作）、《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1990）、《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华语教学出版社，1998，主编）、《网络语言概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主编）、散文集《语言是大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0，主编）。

#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法、 方法论的若干思考

——《路途和手段——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研究方法》序

刘艳春

近些年来，我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界特别重视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这与近几年我国的整体文化生态环境有关，也是我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发展和走向成熟的标志。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学术研究的又一个春天，众多语言学家在开放自由的氛围中，汲取传统营养，借鉴西方新论，并开始逐渐分析、探讨、提出自己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1998年，于根元先生主编出版的《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可以说是对我国应用语言学理论思考的阶段性的总结。与此同时，于先生也一直在思考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方法和方方法论问题。

在1998年的“第四次应用语言学学术讨论会”（由北京广播学院与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上，于根元先生提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应用语言学能不能大发展，主要看队伍建设和理论

员

建设。而方法论建设是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于根元先生在“研究应用语言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研究应用语言学方法论的思路：

（一）要逐步整理出从应用语言学基础理论到技术理论到方法论的脉络比较清楚的彼此联系的网络。

（二）应用语言学方法论同哲学思想方法论有密切的关系，同学术研究一般方法有密切关系，同语言、语言学的特点和语言、语言学研究的特殊方法有密切关系，而又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

（三）要有一个应用语言学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简史。

（四）在讨论制约和发展方法、方法论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发展。

同是在 1983 年，于根元先生开设了“语言学研究方法”课，实际上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于先生在北京广播学院和锦州师范学院（现在的渤海大学）两地上这门方法课，至此先后已经上了五轮。在于先生的引导下，师生共同思考，探讨，经过五轮课的打磨，对方法、方法论的地位、作用、性质，主要研究方法和运用的基本原则等，都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还初步梳理了应用语言学方法，方法论的简史。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编入由于根元先生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应用语言学概论》（1984 年）中。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方法论从语言研究的实践中来。同时由于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跟很多方面发生联系，加上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又决定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必然从多个研究领域中来，具有综合性特征。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方法、方法论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理应把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方法论联系起来。1994年，于根元先生在《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上发表了论文《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这篇论文与1993年出版的《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相比一个显著进步是跟方法和方法论挂上钩。如“我们的研究方法要立足于引导语言丰富、发展。要注意实践中的新问题，要重视第一手材料，要重视调查中的个案，要重视调查中的不同意见。我们在语言学术上要尊重不同意见。要重视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语言的层次理论，也是我们关于语言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层次认识的基础。语言研究方法具有层次性。语言研究的基本的方法是比较方法。其他的方法都是由比较方法衍生出来的。语言研究的方法还具有灵活性、多样性。语言研究要纵横交错，突破历时和共时的严格限制。”（153页，157页）现在于根元先生做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的整理，也是应用语言学理论的一个部分。

我们以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不少论文不太注意研究方法，往往是简单定性、谈感想。有时又常犯“引证病”，以“某某人说”加上部分材料作为论证方法。有时又为方法而方法，用很多数字和图表，不能说明问题，只是装点门面，给论著增加一点“科学”味道。同国外相比我国的语言研究实验、定量等方法也用得少，华东师范大学的金武刚曾对1993年《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10个中文核心期刊中的100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语言学总共100篇论文，在“研究方法”一项的统计中发现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仅有10篇，占总量的10%。（《定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一项来自100篇论文的内容分析》，见《情报资

料工作》(京) 四四年第一期 缘四页。或《社会科学总论》  
四四年第一期 缘四页) 我正在统计《中国语文》中文章的研究方法, 在尚未完成的统计中, 发现采用定量分析研究语言问题的也是少之又少, 有的统计分析也不够科学。

“方法”其实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大致有了认识或思想之后的怎样写好论文的方法。一类是怎样产生这个“认识或思想”的方法, 而后者更是我们要注意要分析要研究要学习的方法。

有了思想如何说明, 没有成规, 就像方法的本义——“沿”“途”。要到达目的地, 可以坐船、坐飞机、坐火车、为了锻炼或欣赏路边景致当然还可以骑自行车或步行。该类方法没成规, 但有原则。写文章、著作同样是交际, 是交流, 是为了更好的合作。所以, 定量、定性、归纳、演绎、比较、分析……尽可用之, 原则是更准确、更科学、更明晰的传达自己的思想, 更易于交流, 更便于合作。原则也有层次性, 而更便于合作应该是最高原则。

文章写作有三个层次, 一个层次是内容浅, 写得浅, 一个层次是内容深, 写得深, 再一个层次是内容深, 写得浅。后者才是高层次, 需要功力, 隐含方法, 甚至是个方法论问题。于根元先生用论文的方式阐述过自己的学术观点, 也尝试着用散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语言、对语言研究的独特感悟。无论是论文还是散文, 于先生的文字总是那样明白晓畅, 深入浅出, 耐人阅读。

研究方法中的高层次是探讨学术认识或思想怎么来的。应用语言学谈这类方法的著作中于先生的这本专著可能还是第一本。有的书为了所谓的科学性一定要谈到研究方法的, 多是有已经有了认识或思想, 回过头来思考用了什么方法, 甚至是应该

用什么方法，因此在谈方法的时候有的流于空泛，有的看似科学，实际上指导性、操作性不强。

于根元先生从事了四十多年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他研究语法、修辞、文改、社会语言学，推普、汉语规范化、作家作品语言，还研究新词新语、广告语言、网络语言，近几年主要在研究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及理论。这本《路途和手段——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有他对自己多年来在各个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记录和总结，也有对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思考和提炼，是表述“认识或思想怎么来的”一本专著，里面包含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和研究窍门。有的是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具体方法，有的则是理论意义很强的关于方法论的阐述。

如：在“我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中他提到研究语法要：“运用综合的手段。要结合近代汉语的、方言的，尤其是语法跟修辞结合的。修辞研究也要注意形式标志。语法问题结合修辞来研究，有时候比较说明问题。”“要注意对‘例外’的研究、比较的研究、方言语法的研究。”“找到立足点，逐步铺开。”在“我研究推广普通话”中提到：“群众不理解的时候不能干。不能跟群众顶牛。”“滚雪球，不是打地基然后盖房子。”“野外调查跟读书结合，……手要勤，及时记录。”其中还谈到作论文的方法：“题目要巧。论文要重视时空点。”在“我研究现代汉语规范”中强调：“不要仅仅是倡导、呼吁，要做，自己做，组织人来做。用学术引导学术。”“注意延伸段和交叉段的研究。语言连续段或者交叉部位的情况，本来是研究的难点也是值得发掘的富矿。”“熟悉中国和东方的古代哲学。是我们研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一条必经之路，也是捷径。”在

## 摇路途和手段摇

“我研究语言规划”中说：“出彩的地方，都是解决难题的地方。难题是研究的好题目。”在“我研究新词新语”中强调：“不能做的时候坚决不做。根据情况随时应变。”在“我研究播音主持语言”里谈到：“要系统读书，读前沿学者和实践者的书。这样就能掌握一个学科的基本的概貌。读了之后要梳理一下。比卡片进一步，是札记性的，是加过工的熟语料，其中有自己的思想。”在“我研究作家作品语言”中还谈到做学问的捷径和检测的方法：“做学问当然有捷径。走别人、自己没有走过的路，才可能是捷径。”“可能处于无竞争状态。很寂寞。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么你还没有走在捷径上。”在“我研究广告语言”中再一次强调了实践的作用，同时谈了主要从事实践和主要研究理论的人怎样将两者结合的问题：“到第一线去实际工作，当然是研究的重要方法。”“我们主要研究实际的，都要研究理论；我们主要研究理论的，都要研究一个实际的领域。我们这些人，两头都研究，而且结合起来研究，两头都要研究好。”在“我研究网络语言”里谈到了他们当时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我们一边编写，一边还在收集材料。这是滚雪球、小秋收、交叉进行。很快就有成果，能鼓励士气。知道哪些方面不足，还可以补充。”在“我研究中国应用语言学史”中谈到：“做学问应该抓到点子上……。这个‘点子上’就是切入点，没有找到这一点，文章和书都不能写，写出来也是搭积木。”“写史也要纵横交错，尤其是横的方面。重复跟交错往往是关联的。不是原样的重复，很可能是交错的地方。要注意。”在“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中说：“一些人心平气和地用对话的形式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是个好办法。”“那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我们去解决，原有的认识或者方法没有远

解决好，我们进一步解决就不会用原来的一套，在认识上或者在方法上或者同时在两个方面都比原来的要进了一步，这进了一步的地方就是理论、方法的创新。理论就是这么来的。”“高效率，经常做力所不及的事。”“研究的方法归根到底是选优，一点点优都要选出来，而且要探索，发展。”

先生如上提到的一些方法，自然，朴素。是些实实在在，触手可及，却又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的、十分实用、操作性强的方法。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是具体方法的话，那么下面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则属于方法论的范畴。“研究要思想和实验两方面结合。”“研究语言最根本的是研究人以及跟社会、自然的关系。我们更要从研究人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深入生活的本质。最根本的学问是融于自然，道法自然，自然是高境界。……不要到没有什么学问的地方去找学问。”“要不断地在运动中检验和调整我们原来的认识。”“融于生活和融于自然，我认为是研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极为重要的根本的方法。经常拿语言生活和社会生活里的道理来检验、修改、补充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里的一些说法，是研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重要方法。经常拿大自然里的道理来检验、修改、补充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里的一些说法，更是研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重要方法。”“我们要融于生活、融于自然、以人为本，可是我们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常常落后甚至背离生活、自然和人。我们的认识需要经常回归到对生活、自然和人的认识。需要经常向生活、自然和人民群众学习。”“创新不够，是因为务实不够，实事求是的不够。”“研究重在建设。有的论文主要是批评，正面建设方面没有什么新见。属于匡谬正俗一类。我们认为发现和介  
苑

绍新的好的更重要。更主要的是我们要把握某个研究领域发展的动向和方向，引导它发展。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是要想站在学术前沿又非做到不可。”“重在建设，很重要是研究者自身思想、素质、学风、能力、方法的建设。”

在于先生的著作“我研究……”的系列文章和“关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若干认识”里，有些是方法，有些是方法论，有些既是方法又是方法论——在一个层次上是方法，在另一个层次上又是方法论。于先生认为方法和方法论的结合点是“自然”，“自然”既是方法，又是方法论。自然是个方法，怎么自然，放松，这是一套方法，不仅仅是态度，有认识，背后有理论。（见《后记》）于根元先生崇尚自然，追求自然。他认为“为道要自然，为人要自然，为学也可以自然。”（同上）

## 二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法、方法论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决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法、方法论的因素”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于根元先生在给北京广播学院 ~~四级~~ 硕士生上“语言学研究方法”课的时候，留了一系列思考题，其中之一就是“决定语言学方法、方法论的因素”。实际上这个题目于先生是在 ~~1993~~ 1993年“第四次应用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上就提到的。我当时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探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法、方法论的决定因素，应该结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法、方法论的发展史来进行。笼统的说，传统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重视历时研究、书面语研究、语言的个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现代语言学看到了他们的

局限性，开始重视共时、口语、语言系统和语言共性研究，重视客观描写。到当代语言学时期，人们又发现了现代语言学的局限性，转换生成语言学用“语言能力”取代“语言行为”，用“动态解释”取代“静态描写”，重视演绎法。其后，人们又感到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局限，提出“交际能力”比语言能力更重要。而交际能力不只是语言问题，要涉及社会、文化、心理等学科，从而又有了更多更综合的方法。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就这样在不断克服局限中不断完善，而方法的更加灵活、多样、综合、客观和科学必将是永远的趋势。

我国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发展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如果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大体上可以为：古代语言学、现代语言学和当代语言学。这三个历史时期，我国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二十世纪以前的古代语言学时期，我国语言研究有两个分支，一支是有关语言哲学的研究，主要活跃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还处于哲学附庸地位的语言学，经常在哲学家们讨论哲学问题时涉及到。由于从哲学层面和角度上来审视和关照语言，在讨论语言问题过程中必定折射出我国传统哲学整体性思维方式的特点。站的层面较高，对语言的有些观点很有见地，同时也许正是这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造成了对语言本身的认识有些大而化之，缺乏细分。另一支是以启蒙教学或解释经典为目的的语文学研究。总体来说，我国语文学研究是很有成绩的，虽然是从文献的阅读、注释、考证，语言材料的汇集和编撰开始的，长时期停留在应用性的工作上，但它从一开始并非只限于应用，也能够不断地在应用中产生诸如收集法、分析法、归纳法、分类法等一些颇具实效性的方法，不足的是缺乏对方

法的总结和提炼，没有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总的来说 20 世纪以前我国重视应用研究和汉语自身特点，有哲学层面的指导，又能够与汉语实际紧密结合，但忽视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忽视向外国学习和借鉴。

从 1918 年的《马氏文通》开始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可以认为是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时期。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一个西方语言学中国化和中国语言学逐渐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中国语言研究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注意向外国学习，注意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哲学层面的指导。如从马建忠开始模仿西方语言学方法和理论体系编写了《马氏文通》后，我国一代语言学家，如黎锦熙、方光焘、吕叔湘、朱德熙等人都把当时国外比较先进的方法引进汉语研究中来，引进以后根据汉语的特点加以适当改造和创新，我国现代语言学理论建设就是在这样模仿、吸收、化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西方语言学的中国化。应该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语言学的主流还是一个西方语言学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语言学在吸收、化用中并不十分顺利的发展着自己，同时也在思索、寻求着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主航道。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国语言研究进入到当代语言学时期，这一时期在语言研究上又有了新的特点，已经逐渐有了自己的思考，开始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语言学研究的方法、方法论。在这一时期我国语言学界思想比较活跃，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渐开始走向全面和科学。语言学家不仅注意借鉴西方先进

10

理论和方法还注意向中国传统学习,不仅仅重视语言的本体研究也重新把应用研究提上日程,在注意语言细化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与哲学的再次结合,我国语言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从历史上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法,方法论的发展受多种因素制约。比如说,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及其成熟程度,受制于当时的工具以及当时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发展。受制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潮。受制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自身因素,受制于研究者对语言本身的认识和对这一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角度以及研究范围的理解和认识等等。

学科自身因素主要是该学科的发展状态和学科地位,它往往决定了人们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范围及研究角度的科学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而这些反过来又决定了该学科的发展和地位。

从很早的时候起,不同国家就已经对语言作过某些研究,但是由于语言处于哲学附庸地位,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作真正的、唯一的研究对象,也不是为语言或为交际而研究语言,只把它视为认识自然的一种手段或了解古代典籍、风俗、习惯和制度的工具。加上研究范围狭窄和研究角度的局限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方法的采用和方法论的发展。

在上古初民时代,人们不可能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甚至谈不上“研究”,只是出于对语言现象的好奇,他们用大胆想象和简单猜测的方法去推断语言的产生。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开始以一定的深度思考探讨哲学问题,这时语言学成了哲学的附庸或解经、宗教的工具,不是以语言自身为研究对象,更不

是为了交际而研究语言。在方法上仍存在许多局限性，如：对语言本身的认识大而化之，缺少分层次的理解和说法，缺少分角度、分语体的说法。尽管后来由于解经的需要和元曲的兴盛，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方法上也已经采用了收集法、分析法、归纳法、分类法，音韵学发展到魏晋又出现反切法等多种方法，但这些方法大都是在解经、训释或编书过程中根据具体需要而偶然运用的，缺乏总结，没有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出于宗教的动机研究语言，表现在古印度梵文的研究上。他们认为梵语是一种神的语言，连一个字母都是不可侵犯的，谁也不能任意改变，这使他们在研究这种语言时格外小心谨慎。具体方法多采用分析法（如对语法的研究）、比较法和分类法（如词源解释、词典编撰）等。但大体来说他们对语法研究多是经验主义的，很少能上升到理性认识。

到欧洲中世纪由于研究范围狭小，仅限于拉丁语，而且为了宗教的目的，对语言的研究只限于翻译和搜集工作，因此在方法上没有多少进步。人们的视线逐渐转移到语言本身是在罗马的影响普及全欧洲以后，当时拉丁语几乎成了各地学校里所教授的唯一语言。在语言研究的方法上是有进步的，只是那时的研究目的是学会拉丁语写作和说话。认为要学会拉丁语，不能没有语法这一工具。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拉丁语法看成科学，而仅仅视为一门技术。因此，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所观察到的事实，是一大堆要遵守的规则，一系列表格和公式，而这些表格和规则又不一定是根据客观的事实归纳出来的，而是由少数语法学家主观规定下来的。这决定了他们在方法上不是描写的，而是规定的。

从 17 世纪到 18 世纪，很多人对语言研究产生了兴趣，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形成了方法论，有了一定的方法论原则。但“真正要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没有几个人”，岑祺祥认为，“这是造成许多不正确的方法论的主要原因”（岑祺祥《语言学史概要》19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语言的研究范围也影响方法、方法论发展。如古希腊、罗马人对语言的看法和语法的学说，从雅典到亚历山大里亚，从亚历山大里亚到罗马，一步一步地扩充，一步一步地发展，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可是他们当时所研究的只限于他们自己的语言，把其他一切语言都看作“野蛮人”的语言，致使语言研究的方法和成果没有交流和比较的机会，进展特别慢，错误也特别多。人们把视线转移到语言本身之后，经历着一个研究对象由窄到宽，即研究范围由狭到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方法向更繁多、方法论大体上向更科学的方向发展。语言研究走到 18 世纪，已经不限于一种语言，开始了对多种语言的研究，语言标本的搜集和梵语在语言比较中的运用促进了历史比较法的产生。在具体方法中除了以前运用的搜集法、观察法、归纳法、分析法、综合法等多种方法外，还运用了统计、类推等方法，并以历史比较的方法论原则加以统摄和贯穿，使历史比较语言学辉煌了一百年。可是索绪尔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尽管它在开辟一个新的、有益的领域方面有无庸置疑的功绩，但并没有建立语言学的真正科学研究，它没有明确研究对象的性质，没有这最基本的一步，任何学派都无法建立起一种科学的方法。因此到普通语言学时期，不仅把研究对象扩大到整个人类的语言，明确了语言的性质，而且把语言作为真正的、唯一的研究对象，为语言而研究

语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一系列的二元划分，实现了对语言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推动语言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对语言的认识也会影响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法的有效性和方法论的科学性。普通语言学时期，对象确定了，研究的范围也逐步扩大起来，但是有些方法解决不了实际生活中出现的语言问题，这与方法是在“语言是封闭的、静态的”，“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无关系。用解决静态语言的方法来解决实际生活中动态的语言事实当然有它的局限性。现在，我国有些学者认识到了动态的、开放的巨系统是语言的本质，在语言研究的目的上提出为交际而研究语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纵横交错的研究方法和一系列其他的具体方法，实践证明，这些方法更有效地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提到研究目的，研究目的当然也影响研究方法。如在索绪尔之后，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学，目的是认识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共项），建立语言的形式化的表述系统，一个包括初始元的公理系统，那么他就不能不使用现有公理系统（如数学、集合、形式逻辑等）中的初始元，那么他就必然要用到数学方法和逻辑方法。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以研究语言的差异为目标，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使用许多语言调查和语言描写的方法。心理语言学以了解人类习得和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为目标，心理过程看不见、摸不着，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使用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而计算机语言学要实现人工智能开发和人机自由对话，那么他们就必然要用到演绎逻辑的手段把规则形式化，用到语料库方法或概率方法等。

工具和科技发展对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法、方法论的影  
源